



明末学风与诗学

The academic atmosphere and poetics in the last period of Ming dynasty

王 逊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明末学风与诗学

The academic atmosphere and poetics in the last
period of Ming dynasty

王 逊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夏 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末学风与诗学/王 逊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4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01-020503-8

I. ①明… II. ①王… III. ①诗学-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45482 号

明末学风与诗学

MINGMO XUEFENG YU SHIXUE

王 逊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25

字数:315 千字

ISBN 978-7-01-020503-8 定价:5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4年7月

序

自宋代程伊川的一句“作文害道”以来，道学与文学之间似乎成为互相乖悖的关系。但中国古代学术与文学具有先天的一体性，唐代古文运动以来，文道互渗的关系更成为共识。与宋代理学家论文的态度明显不同，自元代以降，学术与文学的互渗，理学家流而为文人成为一种新的学术动向，这与元代占据主导地位的金华学派的学术特征有关。同时，也是元代一统之后，程、苏之学融会，一改宋代“南渡以后，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带经堂诗话》卷四）的局面。元代学者屡有浑一学术与文学的论述，如，陈栎云：“盖文章道理实非二致，欲学者由韩柳欧苏词章之文进而粹之以周程张朱理学之文也，以道理深其渊源，以词章壮其气骨，文于是乎无弊矣。”（《定宇集》卷一《太极图说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刘诜云：“文章之与理学本同一源，自孟子未有分也。汉唐以来，文章盛而理学泯，至宋初，文章复大盛，微周程理学亦泯矣。”（《二程先生祠堂》，清抄本，《桂隐文集》卷一）这一风气虽然在明代有所改变，尤其是薛瑄等人恪守宋人矩矱，以“不杂”为“真儒”（薛瑄：《读书录》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标准，认为“文士学做圣贤文词，如中国人学外国人。”（《读书录》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阳明在二十七岁寓京师之时，亦“自念辞章艺能既不足以通至道。”（《阳明先生年谱·孝宗弘治十一年》）遂而以追寻大道为期，辞章与学术似又有殊途异辙的取向。但这也仅是表层现象，文学与理学的深层互动并未真正中绝。尤其是晚明文学思潮的兴起，更是受到阳明心学尤其是左派王学的影响而产生的。李贽的“童心说”即是因龙洞山农叙王实甫《西厢记》中的“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为缘起，对闻见道理提出质疑，进而得出了“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藪”的结论。学术与文学之间的互渗互证，是李贽“童心说”论证的基本方法。李贽是当时思想界的“二大教主”之一，又对晚明文学思潮的兴起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如，晚明文学思潮的主将袁宏道的文学革新思想，即是因访晤李贽这一思想界的“教主”而后形成的，对此，袁中道在《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中有这样的记载：“先生（宏道）既见龙湖，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

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①可见,明代,尤其是晚明时期,学术以及学风与文学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明清龟鼎将移之时,士人们更是将时局的艰危与学风以及诗歌的审美趣味等进行了综合反思。世况的流转与学风嬗变交融互渗,这是明末客观存在的历史,但又是学界鲜有系统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王逊博士着意于对学风转型背景之下的明末诗学进行研究有年,撰成专著《明末学风与诗学》。我有幸得先读之快,遂略述其特色于篇首。

该书以诗学与学风之间的关联为立足点,打通文学与思想及历史、诗学与学术间的界限,从更宽广也更系统的视野来考察明末诗学,确立研究明末诗学的有效途径,并提供方法论意义。全书共分七个部分,在深入探讨明末诗学开展的整体环境,细致剖析明末时人治学态度与方法调整的基础上,围绕“情”之内涵的反思与重建、师古与师心的汇流、典范之争的深入与超越等贯穿明代诗学始终的命题,考察明末诗学的基本面貌、演变机理与独特价值,并进而重新审视明代诗学的发展轨迹,厘清由晚明至清初的传承与演变线索。

该书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观点。如,作者认为,明代学风并非通常认为的偏激霸道、党同伐异,特别是在诗学领域,至少从万历后期以来,时人已能清醒认识到过往之弊,积极予以矫正,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皆有积极改观,诗学领域也随之焕然一新。再如,作者提出,明末诗学在明清诗学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明末文人通过系统反思与梳理,清醒、辩正地认识到了过往诗学主张得失所在,既有对师心流弊之清算,又有对师古价值之重估,上承晚明,又下启清初,既实现了晚明诸家诗学理论的融会贯通,又为清初诗学提供了宝贵经验。

该书突破了长期以来将晚明诗学发展概括为复古—革新一复古再度兴盛的简单化演进模式,摒弃了尚革新而抑复古的价值评判标准,立足于其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与文坛现状,考察诗学发展脉络,并密切联系时人的处境与心态,考量其间的利弊得失。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令人耳目一新。

王逊博士是一位好学敏求,思路开阔,功底扎实的学者。自2007年考入南京大学随我攻读学位以来,在精读原典、梳理学术脉络的基础上,倾心于明末学风与文学研究有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多方搜集材料,孜孜竭泽而渔。在此基础上,研精殚思,明晰地勾勒了明末诗学的整体风貌以及明代诗学的演进轨迹。这一经多年积淀而成的成果,因其扎实的学风与敏锐的视

^① 《吏部验封司郎中郎先生行状》,《珂雪斋集》卷之十八。

角而见列于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并以专著《明末学风与诗学》结项。余在为此感到欣然之外,更有对王逊博士未来学术精进的期待:因为他矢志于学,且知如何为学,更因为他具有学术精进的品格:诚实而热情。是为序。

周 群

己亥元宵于远山近藤斋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第一章 重“学”风尚的形成与凸显	31
第一节 明末学术与文学之关涉	31
第二节 反思科举之陋	34
第三节 检讨心学之虚	59
第四节 批判七子、竟陵之俗及后学之失	71
第二章 治学态度与方法的调整	85
第一节 治学态度之新貌	85
第二节 治学方法之转型	104
第三节 批评方式之精进	118
第三章 “情”之内涵的反思与重建	129
第一节 复归风雅	129
第二节 学风与诗学之互动	151
第三节 文章与世运	160
第四节 学问与性情	169
第四章 师古与师心的汇流	176
第一节 师古与师心利弊的重新检讨	177
第二节 为师古正名	180
第三节 汇流之呈现	196
第五章 典范之争的深入与超越	225
第一节 秦汉—唐宋之争的流变	226

第二节 宋诗的发现	246
余 论	266
参考文献	270
后 记	278

绪 论

明中后期文艺思潮(惯常会以一较为含混的“晚明文学思潮”概念指称)因其“在整个中国文学史、文论史上都具有相当的意义分量”^①,兼之“如果就传统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关系这一点上看,晚明文学却是与之最为密切、最为直接的”^②,向来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与难点。研究者视角不一、思路各异,形成了多元研究范式,“时段”的界定与确立,即选取何种时间片段,或者说将哪一段历史进程赋予统一的独特意义作为系统考察的对象,成为其中一个具有鲜明标识意义的现象。“‘时段’的成立即是发现了材料间固有的可连接、贯通的意义,并予以历史书写的方式”^③。历史发展前后相继、连绵不绝,为了研究的可能与便利,我们往往集中于某一特定对象,截取出与之相关的片段,重新予以整合、探究,此一现象发展、演变的活动过程构成了我们予以考察的(或者说“切割”出来的)时间段。就此而论,所谓的“时间段”应当是由具体现象的发展轨迹所“限定”,而非依据个人意志或社会意识“遴选”所得,但任何文学现象都不是独立发展的孤立活动,那么所谓的时间段也不能从历史长河中断然抽身,彼此交杂、头绪纷呈系其本然状态,因此,时间段虽由发展轨迹限定,发展轨迹却有赖人来界定或曰呈现,时间段到底还是主观“遴选”的产物,并因之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甚而时代思潮、文化氛围、政治形势等因素紧密相关,进而形成了所谓的“研究范式”。在看似“单纯”的时间界定背后往往暗含了或形成了某些约定俗成的“共识”,影响甚而决定了我们的研究思路 and 方式。

一、重建“明末”的理解视域

以本书关注的研究时段而言,相关说法有“晚明”、“明季”、“明末”、“明清之际”、“明末清初”等多种,它们在“研究对象、历史时段等方面均有

① 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② 吴承学、李光摩:《“五四”与晚明——20世纪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关系的研究》,《文学遗产》2002年第3期。

③ 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重合之处,然而又都蕴含着不同的问题意识、历史关切和价值判断、情感倾向”^①。比较而言,作为时间概念的“明末”相对弱势,长期淹没在“晚明”或“明清之际”、“明末清初”的阐释框架中,致使这一阶段文学思想的意义与价值未能得到深入揭示。有鉴于此,我们应当从时间界定入手,重建“明末”的理解视域。

(一) 明末、晚明、明末清初/明清之际的界定

在通常的理解中,一个王朝的末期往往与“灭亡”相联系,故而所谓“明末”,实则就是明王朝走向覆亡的最后阶段。这一阶段可以从万历朝算起,因为自明清之际以来就有“明亡于万历”之说,譬如清修《明史》,论及神宗,云“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而对“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之说表示认可^②。清代史学家赵翼亦承此论,“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③。影响所及,在相关的历史著作中,会以“灭亡”或“覆灭”为主题,将万历以后的历史作为一整体进行论述。如白寿彝总主编之《中国通史》,其明代部分将有明一代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明朝的建立、明朝的兴盛、明朝的中衰、明朝的灭亡,而“明朝的灭亡”正是起始于万历朝。书中称“万历中叶以后,明朝在政治、经济、军事、财政诸方面,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危机,日益削弱着明朝的统治,促成和加速了明朝的崩溃”^④。但此类说法往往是事后追溯的结果,在更多的历史叙述中则从事实层面出发,认为泰昌、天启、崇祯三朝是明王朝内外忧患加剧、走向覆灭的最后阶段,即所谓“明末”(由于光宗即位三十余日即崩,故而有些论著径称天启、崇祯两朝),此种意见更为契合“末期”的描述。如在孟森看来,明虽坏于万历,然尚是“明亡之征兆”,是“决裂之期”^⑤,而“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自以为非亡国之君也……经万历之败坏,天启之桎丧……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⑥,故其《明清史讲义》第六章题为“天启崇祯两朝乱亡之炯鉴”。又有学者联系史实,对此观点有进一步的申发,称:“明亡的关键,就在于天启、崇祯两朝初时虽有兴利除弊之举,但迅速重蹈覆辙,不但没尽除万历时期各项乱政,相反再添一系列弊端。”“启、

① 赵强、王确:《何谓“晚明”?——对“晚明”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反思》,《求是学刊》2013年第6期。

② 张廷玉等:《明史·神宗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95页。

③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卷35,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29页。

④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1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页。

⑤ 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6页。

⑥ 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3页。

崇祯两朝不仅没有清除神宗朝种种腐败,却进一步发展了前朝的弊政,致使明政权迅速溃烂。总之,天启、崇祯两朝 24 年真正把明朝彻底葬送掉,他们也难逃其咎。”^①具体观点不妨细究,个中表露出某种倾向和判断却是不争的事实。海外学人也有如此立论者,如《剑桥中国明代史》([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即将泰昌、天启、崇祯三朝作为专章进行探讨。就此,在本书的论述框架中,作为“时段”的“明末”系以天启、崇祯时期为主,有时为了更好地说明发展趋势则不免适当向万历后期追溯。

对“明末”的使用多着眼于“灭亡”,系出于探讨、总结一代王朝兴亡成败经验教训的考虑。或由于关注视角不同,围绕“明末”立论的情况在文学、诗学或思想文化领域尚不多见,^②某些著作会将“明末”列为专章或专节,如尹恭弘《明代诗文发展史》设有“明末时期诗文创作园地里的多元化(上)”、“明末时期诗文创作园地里的多元化(下)”、“明末爱国主义的诗文创作”三个章节,但此处“明末”的标举系照搬历史分期,并无特定深意,且依照尹氏的意见,“从万历到明末,是明代诗文发展的第三期”^③,总体框架仍不超出传统的晚明或明后期这一模式,基本认识也大致相同,说“这时期明代诗文的特点,就在于整个诗文创作都处在崇尚自我个体性与主体性的时代”^④。凡涉及思想、风尚层面,出现频率较高的是其他一些时间限定(当然,相关说法都与“明末”有密切的关系,且多将它囊括在内)。较常见的说法有“后期”,如罗宗强著有《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一书,其在界定“明代后期”时明确称,要从思想文化演变的实际出发,故而不采用一般人将明代后期断自万历的观点,而是将明代后期之展开,“追溯至嘉靖前后”^⑤,则其所理解的明代后期包括了嘉靖之后的所有历史,明末自然从属其中。此外还有晚期、中晚期、中后期等说法,但使用频率最高的无疑是“晚明”和“明末清初”或“明清之际”^⑥。作为和“明末”性质相似的时间概念,“晚明”、

① 李治亭:《明亡于神宗辨》,《史学集刊》1998 年第 2 期。

② 经检索,径以“明末”这一时间段为题的著作有孙一珍的《明末白话短篇小说抉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姚蓉的《明末云间三子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黄海章的《明末广东抗清诗人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等。

③ 尹恭弘:《明代诗文发展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 页。

④ 尹恭弘:《明代诗文发展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 页。

⑤ 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 页。

⑥ 相关成果众多,仅就文学而言,以“晚明”为题者包括了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东方出版社 1997 年版)、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周群《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年版)等二十余种;以“明末清初”为题者包括了孙立《明末清初诗论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

“明末清初”和“明清之际”在使用时的内涵较为模糊,缺乏一致的认识。有学者曾对“晚明”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归纳,称:

在以往的研究中,“晚明”一词应用的时间范围并无规范界定。有用为明末同义语的,有指称嘉靖以至明末的,也有以万历划线的;还有更为宽泛的概念,以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为例,书中将晚明等同于明季,而实际上所指并非明末,而是自万历以迄清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为止,也即明末清初。^①

因而,在对“晚明”的使用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晚明”专指明万历朝的前中期阶段,而广义的“晚明”则自嘉靖后期开始,一直可以延伸到清初,这自然也囊括了明末部分。

至于“明末清初”/“明清之际”的使用情况,也有学者进行了梳理,发现学界对上述阶段的界定主要有三种,即明万历年间到清康熙年间、明嘉靖一万历到清乾隆—嘉庆年间、明崇祯末年到清康熙前期。^②除第三种外,前两种观点都囊括了我们所界定的“明末”阶段。

(二)“明末”意识的缺失

换言之,虽然文学、思想文化研究界很少径以“明末”为题,但他们的探讨范围往往都涵盖了这一时期,只不过或是向前追溯,或是向后延伸,即相关研究更倾向于将“明末”视为某更大范围中的一部分来予以探讨,但在看似“囊括”的背后透露出的却是实质性忽略。

就“晚明”而论,哪怕是广义的“晚明”,当提及这一时间概念时,我们想到的往往不是万历中期以后的整个历史以及其间的全部文人活动和文学现象,而往往将视角停留在公安、竟陵又或李贽、三袁等人处,龚鹏程对学界的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续编》(中华书局 2006 年版)、孙书磊《明末清初戏剧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李灿朝《越水悲歌——明末清初越中文人及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林继中《明末清初散文探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许军《明末清初时事小说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杨宗红《理学视域下明末清初话本小说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张则桐《明末清初散文探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等十数种,陈文新总主编之《中国文学编年史》,也以明末清初作为单独一卷;以“明清之际”为题者包括了林岗《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李康化《明清之际江南词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 2001 年版)、莎日娜《明清之际章回小说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等七八种。至于文化、思想等其他领域,数量也非常巨大,由此可见学界之倾向。

① 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2 页。

② 详参朱萍:《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 页。

“晚明思潮”研究情况曾有如下描述:

所谓“晚明思潮”显然主要即是指文学上的公安派以及与公安派关系密切的李卓吾等人。这些人,又往往与王阳明后学发展以成之“泰州学派”有很深的渊源。因此,近几十年来,讨论晚明思潮,事实上即是以公安派和泰州学派为核心的。在文学上,论者主要论析公安派如何反对拟古,提倡抒发性灵、表现自我,特别注意到小品文这个文类,并强调公安派文论与李贽“童心说”的关系。^①

这一说法并非全然夸大之词,比如有学者就认为:

所谓“晚明文学思潮”,指的是明代万历前后在阳明心学及泰州学派影响下所形成的一股弘扬主体、张扬个性、正视人欲为其主要精神的文学思潮。明代万历时期,以李卓吾、公安派、《金瓶梅》、《牡丹亭》、《三言》的出现为标志,把这股声势浩大的文学思潮推向高峰。^②

对照众多论著不难发现,所谓的“晚明思潮”往往就是“晚明革新思潮”(或“晚明解放思潮”),上述引文中提到的概念,如泰州学派、主体、个性、人欲以及性灵、师心、反复古往往构成了这类论述的中心话题,我们亦可以在这些著述中发现一条清晰的“王学—泰州—公安”的发展脉络,有学者总结说“时至今日,谈论晚明文学,大多已然是这一路向。先谈社会环境,即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情境——在思想界的反映(李贽和王学左派的影响)——在文学界的反映(公安三袁等)”^③。当步入天启、崇祯年间,“这股声势浩大的文学思潮已趋于消歇”^④,相关论述也到此结束。与此相呼应,很多著述的明后期部分只涉及公安、竟陵,似乎整个明代文学思潮到此终结。^⑤如

① 龚鹏程:《晚明思潮》,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页。

② 宋克夫:《论晚明文学思潮的消歇》,《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

③ 吴承学、李光摩:《“五四”与晚明——20世纪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关系的研究》,《文学遗产》2002年第3期。

④ 宋克夫:《论晚明文学思潮的消歇》,《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当然,这一说法是否合适还值得商榷。

⑤ 某些论著会将“晚明”限定在万历前中期,逻辑上的偏差自然可以避免,但这实则也强化了某个印象,即在研究者看来,晚明理当和“革新”联系在一块,凡不具备这种精神气质的,都应被排除出去。当下的研究中,对明末部分有较详尽且客观关注者当属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之《中国文学批评史》及其后出版的七卷本批评史之明代卷。

张少康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明代部分以“公安三袁的‘性灵说’”收尾,而蔡镇楚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 2005 年版)也以“七子反对派文学批评”作为明代部分的终结。或许在某些学者看来,其后(即明末)的文学活动及文学思想又重提“复古”主张,是对晚明革新思潮的背叛,是逆潮流而动。如谈蓓芳称:“明代后期文学思想的演变,实可分为两个阶段:从李梦阳到屠隆到袁宏道的前期,是向上的发展;从袁宏道后期到竟陵派是向下的发展。”^①既然是“向下”,在特定思维的约束下,就意味着没有进步意义,不值得探讨,故而袁小修后期的转变就已然遭致了不少非议。但这样一种“晚明”,不管它如何“进步”,如何有价值,毕竟不是全璧,我们的“晚明”书写存在明显的缺失与断裂。在一种观念的指引下,突出并表彰一部分内容,而将与此“有悖”(是否真的如此)的部分一概弃之不顾,此种看法不免狭隘。

这一状况在近年来有所改观,陈子龙、艾南英、明末文社等内容日益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有了一定的探讨,但问题在于,一则就数量而言,与此相关的内容完全不能望“革新”的晚明之项背。再者,虽说我们设定(或试图设定)了一个“完整的晚明”意识,理解方式仍停留在“部分晚明”水平上,并以此作为我们探讨“复古”再兴部分的基础:或是将其中的“进步”部分予以放大,作为其具有价值的依据,无形中也进一步强化了先在指导观念的正确无疑;或是就其中的“倒退”内容展开批判,并在深感遗憾的基础上予以反思,有所偏颇、忽略依然不可避免。^②在当下的“晚明”研究中有一个颇为“奇怪”的逻辑,即扬革新而抑复古,若是对复古派作出了肯定性的评价,必然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观念与“革新”思想存有关联,^③却很少考虑就其文学、

① 谈蓓芳:《明代后期文学思想演变的一个侧面——从屠隆到竟陵派》,《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

② 如张少康所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是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基础上修订而成,其明代部分新增一节题为“明代中后期的‘神韵’说”,探讨复古主义思潮由格调向神韵的转变。此类描述多半是要说明在革新思潮的冲击下,复古思潮也顺应时势有所变化,并将此视为晚明思潮的走向,根本的思维方式并无二致。

③ 譬如章培恒的《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一文独辟蹊径,详细剖析了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之间的内在继承关系;另有陈建华《晚明文学的先驱——李梦阳》(《学术月刊》1986年第8期),该文从李梦阳的思想基础、文学主张及创作三个方面论述了作为复古派先驱和领袖的李梦阳与晚明文学之间的关系及作用,较之章文,更为深入细致,且态度更为直接明确,这从题目上就可获得清晰印象。此种观点流布后影响极大,七子派评价得以转变与此关系密切,且多半因袭此一思路。许苏民、许广民《明代文艺启蒙的三次冲击波》(《云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一文更是将以李梦阳、何景明为核心的“前七子”视为明代文艺启蒙思潮发展过程中第一次强有力的冲击波,完全去除了他们身上的“落后”标签,纳入到“进步”潮流中。

诗学本身而言是否存在有价值、有特色之处。或者从根本上说,复古与革新到底只是单纯的研究对象?还是已经包含评价标准?答案显然是明确的,个中逻辑正是上述观念的鲜明体现。有关“明末”的探讨已然少量,还要看他人“脸色”,其自身之特点与意义无从得到彰显。故而,在当下的“晚明”研究范式下,“明末”部分的内容关注不够,探讨不深。若是不能跳出这一思维模式,从“明末”的角度或者“明代”的角度甚而“明—清”的角度来审视,我们的理解也很难获得根本推进。

再论“明清之际”与“明末清初”。上述总结只注意到了时间划分上的细微差异,却没有意识到这些差异背后迥然有别的思维方式与处理模式。从当下学界对这两个时间段的使用来看,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情况:其一,对于这一时段的理解大致是指从万历到清初,如此设定是因人着眼,因为此期的不少文人、思想家,如钱牧斋、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吴梅村等,其生平活动跨越了两个时段,无法断然切割,与此相关的著作有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孙立《明末清初诗论研究》等;其二,对时间的理解与上述相当,但却是着眼于文体,认为此一时段系某些文体发展的特殊时期,如果强行分割,难以客观描述其发展脉络,比如莎日娜《明清之际章回小说研究》、朱萍《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研究》等;其三,对这一时段的理解限定在明崇祯末年到清康熙前期,重点考量明清易代给予士人的影响,比如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等。

第一种情况系因人立论,看似合理,但在不少著述中,虽然这些对象跨越两个时代,相关探讨却往往被置于清代部分,论者重点突出了他们对清初文学的开创之功,有人称:

清初诗坛的耆宿,都是明朝遗老。……这些遗民诗人……由于他们与明代作家处于不同的生活环境,他们反对明代前后七子及公安竟陵的复古与浪漫。^①

又称: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中,经学推顾炎武(亭林),史学推黄宗羲(梨洲),哲学推王夫之(船山)。三人均为文坛耆宿,他们同时又是清诗的

^① 周伟明:《明清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49—350页。

开创者^①。

又如论钱谦益,虽意识到他的文艺思想“承传明代”,但却只关注他的“诗论及诗作,对清代诗坛影响极大”、“开创有清一代诗风”的一面。^② 这些论述自有其道理,却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两个重要问题:首先,所谓的开创之功,当是指1644年清朝建立而言,我们的一应研究对象却是贯穿两个时代,他们的生活与思想在两个阶段皆有发展,如今将所有内容都归入清初,且突出强调“他们与明代作家处于不同的生活环境”,似乎他们在明末的那一部分活动完全不存在,这明显与事实不符;其次,尽管说这些人在清初拥有重要影响,但总体来说,这些人不论是声望地位的取得、思想观念的形成还是文学活动的开展,主要是在明末。龚鹏程指出“明朝灭亡时,吴梅村已三十六岁,黄梨洲方以智均已三十四岁,顾亭林则三十二岁,其诗文气格及思想体式,早得成就”^③,余可见一斑。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一书,第四、第五章标题分别为“明末清初的学者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明末清初学者治学的态度和治学的方法”,但在展开论述时往往径称“明末”云云,谢氏此举似乎可作一旁证,提醒我们人虽处两个时期,思想主要还是属于“明末”,至少说“明末”对他们的意义不可小视。我们固然要承认他们对于清代文学的开创之功,却也不可忽视他们是明末文坛的一员,且是重要一员,他们不少的思想、观点往往是就明末的文学状况而发。

第二种情况中,关注的是作为整体的“明末清初”历史,相关论述往往会强调之所以将这一时段联系起来作一整体考察不是随意之举,而是充分注意到了某一文体或现象的发展趋势。如吴熊和论词时称:

在文学史上,尤其在词史上,有必要把天启、崇祯到康熙初年的50年间,作为虽然分属两期,但前后相继、传承有序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来研究。清词的兴盛当然有清初的特殊背景,但自天启、崇祯以来,词的复兴气候业已形成。清初的一些词派,其源概出于明末。这些词派创于明末而盛于清初,然而其原委始末,并不限于一代人,往往是同一风会所趋之下相继而起、各有承传的两代人或三代人。^④

① 周伟明:《明清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57页。

② 参见周伟明:《明清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377页。

③ 龚鹏程:《晚明思潮》,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页。

④ 吴熊和:《吴熊和词学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372页。